

『贵州学者文丛』编辑出版委员会

第一辑

忧患集

刘扬烈文选



著

刘扬烈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千百年来维系国家民族发展与前途命运的一种文化意识。研究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患民的精神形态、进步意义、历史局限以及在当代社会的表现，通过权衡其利弊得失，对于促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貴州學者文丛

「第一輯」

「貴州學者文丛」編輯出版委員會



劉揚烈 文選

忧 患 集

劉揚烈 / 著



貴州出版集團
貴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患集:刘扬烈文选/刘扬烈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6

(贵州学者文丛)

ISBN 978-7-221-14573-4

I. ①忧…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8571号

贵州学者文丛第一辑

忧 患 集 刘扬烈 文选

刘扬烈 / 著

出 版 人: 苏 桦

责任编辑: 戴 俊 杨进梅

装帧设计: 刘 津 陈 电

文丛名题写: 戴明贤

文丛名治印: 喻民康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550081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mm 1/32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19.75

书 号: ISBN 978-7-221-14573-4

定 价: 60.00元

本书获

2017 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 “贵州学者文丛”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慕德贵

成 员 顾 久 徐 静 谢 念 朱新武

黄定承 宋 健 苏 桦

办公室主任 谢 念 朱新武

◎ “贵州学者文丛” 编辑部

主 编 乐黛云

执行主编 顾 久

成 员 张新民 翁家烈 冯祖贻 何光渝

谢丹华 戴 冰 王尧礼 戴 俊



刘扬烈

1935年春出生于贵州省松桃县，苗族。1957年毕业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为西南大学教授，有突出贡献专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四川省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银河系》诗刊执行主编、巴渝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总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基本的、深沉的和持久的力量。贵州地处祖国西南腹地，历史悠久，文化多彩。当中国进入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历史阶段，人们从对贵州的“传统”识读转变为对贵州的“现代”惊喜。在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火热实践中，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百姓富、生态美的景象犹如灿烂的画卷徐徐展开。而这一变化，很大程度缘于贵州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缘于贵州人在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文化力量支撑，缘于对文脉的持续夯实和丰富延展。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智慧扮演着引领社会进步的角色，而作为智慧的载体——人，或以细微力量奉献于故土，或以毕生所有倾力于建设，或以所拥学识聚焦于文明。贵州大地曾经出现的“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人文景象，一直激励着后人励精图治，奋发赶超。在各个历史阶段，贵州涌现出一批批执着于家园建设的热血男儿、巾帼英豪。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贵州学术繁荣发展，人才辈出，新作迭现，在省内外乃至海外成长起一批成果丰硕、有学术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山川风物的每一点变化，人文气韵的每一点累积，无不昭示“贵州精神”“贵州智慧”的现实呈现，折射出时代潮涌背景之下贵州人的专注与努力。

以此为情感触发点，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精心策划指导“贵州学者文丛”（以下简称“文丛”）编辑出版，旨在树立和刻画让人敬仰的人文景象。“文丛”邀请了在当代学术界有影响力的贵州籍或者非贵州籍但对贵州有研究的学者，整理他们的学术成果，承前启后，激励后人，放眼贵州，观照世界，让贵州的形象闪亮，让贵州的声音响亮，让贵州的智慧铮亮。“文丛”的作者既包括如乐黛云、陈祖武、刘纲纪、涂纪亮、曹顺庆、刘扬忠、刘扬烈、何光沪、张朋园等贵州籍的著名学者，又包括非贵州籍但在贵州生活过的专家学者，如钱理群、吴雁南、彭兆荣等，博采众家之长，集中展示贵州文化之风貌。“文丛”在内容上，以文史哲为主，同时又兼采风物；形式上，在保证萃选诸学者的学术精华内容外，兼顾通俗性，以扩大“文丛”的读者覆盖面。

感谢“文丛”的全体作者及其后人，他们客观严谨的学术创新精神、浓烈的乡梓情怀、无私的奉献精神，激励着我们用真心、细心、诚心来编辑出版好这套丛书。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道”就是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精神支点，值得我们用心、用力去寻觅和追求。希望本“文丛”的出版，能弥贵州文化之气韵，能彰贵州精神之亮点，为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添砖加瓦、催波助力。

“贵州学者文丛”编委会

2018年4月

代序

儒家忧患意识与中国知识分子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千百年来维系国家民族发展与前途命运的一种文化意识，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也属于治国安民的政治范畴。弘扬这一传统文化，对于促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患民的种种形态、进步意义、历史局限以及它在当代社会的表现，作一些初步梳理，并权衡其利弊得失。

一、忧患意识的历史渊源

“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

《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所谓忧患，大致包括忧己患名、忧生患命、忧道患志和忧国惠民等几个方面。或表现为对自己不幸命运的喟叹，或展示为对有限生命与无限宇宙之悬殊、矛盾的感慨，或为追求理想的人生模式不可得而哀伤，或为国家民族的危亡、人民群众的苦难而担忧或苦斗。这都是对人生的探索，标志着人格理想的觉醒。其中当然以“忧国惠民”价值最高，影响特别深广。它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儒家的“忧患意识”孕育于春秋时代，其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孔子和孟子。孔、孟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品质，“礼”则是一种社会制度和伦理规范。孔子解释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八佾》）。仁是礼的精神支柱，礼则是实现仁的有效保证，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孟子发展这种学说，提出“以德王天下”的政治主张。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确立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

“（一个国家）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舜发于畎亩之中》）孟子告诫统治者：“乐民之所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由此不难看出，孟子的忧患思想是很强烈的。总之，孔、孟都希望看到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黎民不饥寒”（《孟子·梁惠王上》）的稳定而有秩序的社会，担心的是出现“礼崩乐坏”、百姓动荡不安的局面，孔、孟思想中的忧患意识是显而易见的。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世界”以礼义为纪，各司其职，团结互助，和睦相处，是儒家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仁人君子忧国惠民，就是为了实现这种社会理想。它激励着中国世世代代的知识分子，为此而终生奋斗不息。司马迁所歌颂的“发愤之所为作”的圣贤先哲，鲁迅所赞扬的那种“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都是这方面的楷模。

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封建宗法制已逐步确立。因为，儒家的忧患意识与这种宗法社会关系极为密切。“国家”二字浓缩了“国”和“家”的关系；

一个家庭是国家的缩影，一个国家是家庭和家庭的扩大，家国同构，身、家、族、国融为一体。忧国惠民必须注入这种血缘因素，它既是一种动力，又是一种累赘。孔子强调：“入则孝，出则弟，谨恩赐信，泛爱众而亲仁”；“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忠孝一统，族权与政权一致。儒家正是利用这种血缘、伦理情感，依靠宗法社会关系，以构筑其仁学体系。倒过来，则更强化了封建宗法社会。因为，儒家的忧患意识常常与人格悲剧联系在一起，势必潜伏着不可逆转的精神危机，导致无数先贤的不幸命运，行程坎坷，演奏出一曲曲历史的悲歌与壮歌。

二、“忧国惠民”与忠君报国

由于封建宗法制的家国同构，忧国惠民必须与忠君报国联结在一起。君王是天之骄子，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威，是国家的主宰，社稷的象征。被神化了的君权，带来儒士的愚忠和百姓的迷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于是，忧患的自由成了“他由”，主动变成了被动，从而使许多志士仁人的爱国壮举演成一幕幕悲剧。

这类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特别是在祖国危亡的关头。忧国惠民本来是一种崇高的道德风范，具有伟大的政治目标和无私的献身精神，但是在旧时代却始终渗透着忠君思想，带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屈原“哀民生之多艰”，“恐皇與之败绩”，为了挽救楚国免于灭亡，他冒死忠谏，与投降派

进行顽强的斗争。然而，昏聩的楚怀王不但没有采纳忠言，反而将他流放到洞庭湖一带。屈原壮志未酬，又眼看郢都陷落，百姓涂炭，悲愤交加，乃自沉汨罗。他留给后世的是满腔忠愤，一曲悲歌。岳飞壮怀激烈，精忠报国，在《满江红》一词中立下誓言：“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决心“踏破贺兰山”，“收拾旧山河”；可是面对奸贼与皇上的十二道金牌，明知是陷阱，却服服帖帖地听命，终致遇害。可谓慷慨悲壮，饮恨千古！

历史上还有许多有识之士，既有学问又有才干，效忠祖国，体察民情，但却不被重用，或屡遭贬谪，一生坎坷，壮志难酬。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陆游……莫不如此。司马迁因替李陵辩诬而受宫刑，发愤著书，完成一部《史记》，成了史家绝唱，但在政治上却一直失意，未能展其宏图。李白被权贵排斥，又因永王一案受累而遭流放，虽中途遇赦却难再展壮志，终至病逝他乡。苏东坡因党争获咎，始被下狱，后被贬官。尽管他每到一处都造福于民，兴修水利，拯救灾荒，颇富政绩，但因旧账未了，一贬再贬。辛弃疾一生坚持抗金，敢于为民请命，曾亲率五十骑闯入拥有五万重兵的敌营，活捉叛贼张安国。正当用人抗敌之际，他偏被闲置一旁，报国无门，忧郁致死……这类事例举不胜举。总之，历史上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或因直言而招祸，或因愚忠而冤死，或为耿直而遭妒，或遇昏君志难伸，大多难以摆脱悲剧的命运。

本来，国家的危亡，人民的苦难是忧患的根本原因。可是

由于受封建宗法统治的束缚，人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主身上，笃信忠君就是报国，报国必须忠君；即使遇到昏庸残暴的皇帝，也不能不以忠求全，从人格的扭曲走向毁灭。历史上圣君明主固然有之，但更多的封建帝王并不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以人民利益为本，于是形成昏暗的现实与志士忧患意识的尖锐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不可调和，忧患越深，冲突益烈，因此必然导致一幕幕悲剧重演，一曲曲哀歌从屈原唱到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张学良、杨虎城……如果说宗法制度，家长统治是这种人格悲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忧患意识便是其心理基础。由此而来，这类人格悲剧的扮演者总是自觉的、心甘情愿的，当事者具有深层的痛苦体验。屈原为了挽救楚国的危亡，奔走呼号，“虽九死其犹未悔”，洞庭湖滨，湘江河畔，莫不洒下他悲愤的血泪；诸葛亮为了复兴汉室，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出谋划策，鞠躬尽瘁，但因后主无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林则徐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力排众议，虎门禁烟，顽强抗英，只落得罢官还乡，遗恨终生；张学良反对内战，逼蒋抗日，发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却被软禁终生，永远地失去了自由……

以上史实中不难看出，志士仁人们的忧国忧民，一心报效祖国的精神与忠君思想是融为一体的。他们越是不被信任，遭受打击排斥乃至摧残迫害，反而越加执着忠诚；越是达不到忧患目的，反而越加热烈地追求。有时候甚至不顾实际效果，只求一身正气，一世清名。所以，屈原被流放后仍念念不忘“恐

皇舆之败绩”；岳飞统帅重兵在前线杀敌，却应诏而归，冤死风波亭，终其生而无悔；年逾百岁的张学良还说，他用兵谏逼蒋抗日的目的达到后，甘愿以死谢“罪”，所以被软禁 50 多年竟没有怨恨。这种自觉的悲剧选择，实际上已经成为自在选择，千年的文化积淀铸就了这一传统模式，一直影响着子孙后代，流传到如今。新中国成立 17 年后爆发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全民族的灾难，便特具这种悲剧意识。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制造的造神运动把八亿人民卷进一场人为的“阶级斗争”和内部厮杀，弄得民穷财尽，濒于崩溃。“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留给后世的是无限的感慨与无尽的反思。忧患固然是人格的自觉，可一旦与宗法制，与忠君、神化等联系在一起，人的主体性就会被抹杀从而被动受制，演成惨痛的历史悲剧。

三、忧患的变态——定向解脱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忧患具有激励作用，可以促人发愤有为，忘我献身。当忧患的目的难以实现时，又常常伴随着深切的痛苦体验，郁结难解，煎熬倍增。所以，当忧患得不到伸张，理想、正义遭受挫折时，有的人便由忧患走向自我解脱。这是忧国患民的变态反映。把抑郁转向某种悖离的变相选择，表面上似乎已摆脱或超越了忧患，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也不可能超越，只不过显示了一种人格价值，求得心理上的某种平衡而已。

一种表现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式的。他们不与统治者合作，放纵不羁，把忧患消融于醉酒炼丹之中。阮籍和嵇康可

说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阮籍处于魏晋政权更迭的时代，上层统治者内部斗争尖锐复杂，名士常遭迫害，很难保全。面对腐败黑暗的政治，他深为不满，但又无力抗衡，只好采取消极反抗的态度。崇尚老庄，借酒浇愁，醉酒佯狂，实际上内心隐藏着深深的痛苦。《晋书·阮籍传》就有关于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的记载。济世之志完全被扭曲，那种难耐的痛苦和愤懑只有在诗歌里才得到隐约曲折的发泄：“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见《咏怀诗》）他就是这样在痛苦中消极对抗司马氏的暴政，保持着名士的人格。嵇康的处境与阮籍相同，他一面清心寡欲，一面却刚肠嫉恶，对现实采取了激烈的反抗态度。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对挚友山涛被迫应诏表示不可容忍，更对司马氏政权的残暴统治表示极大的轻蔑，终致招来杀身之祸。他们的行为看似荒诞，实际上并非不可理解。

另一种表现是陶渊明式的。陶渊明因为看透了官场腐败，不为五斗米折腰，于是远离政治，退隐山林，以田园为乐，在清静自然中求得和谐。《归去来兮辞》表达得十分清楚：“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但是他既有恬淡轻松的一面，也有愤然怒目的一面；既描绘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又抒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反抗意志，表明其内心深处仍然是不平静的。隐居应该也是一种对抗。在黑暗政治下，洁身自好，用退隐以保全人格，虽于忧患实质无补，